

析缪荃孙藏书

萧东发 李云

在清中叶以前,我国大多数私人藏书的主要目的侧重于藏,即所谓贮之于阁,秘不示人,以传后代。1840年后,随着学术风气的转变,思想认识的进步,一些藏书家,特别是把藏书作为治学辅助手段的学者型藏书家,无论在藏书品种上,还是在藏书的指导思想上均逐渐发生了变化,其显著特征就是藏书的目的不是在藏而是在用。缪荃孙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典型人物。

缪荃孙,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号艺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九日生于江阴城西二十里的中港镇缪氏祖居西宅,1919年11月卒,享年七十六岁。

“先生生而颖异,十一岁毕《五经》。”^①十七岁攻经学、小学;二十一岁治文史,始为考订之学。“先后入将军崇文勤公、总督吴勤惠公、川东道姚彦土方伯幕。”^②光绪元年(1875),三十二岁,入张之洞幕府,撰《书目答问》,为目录之学。次年中进士,拔庶吉士,授翰林院一等编修,曾编纂《顺天府志》、《湖北通志》以及《清史稿》中儒林、文苑、孝友、循吏、隐逸等传,历主南菁、钟山、涑源、经心等书院讲席。毕生研究文史,考录金石,校订旧籍。其收集典籍,整理家藏,使用图书的藏书活动一直是围绕着他的学术活动而展开的,正如伦明所讲,缪荃孙一生以藏书为事业。观缪氏藏书活动,特别是他开明的藏书思想,不但其前人不

能与之相比，同代人多显逊色，就是今人看来也是值得研究继承。

—

缪荃孙的藏书主要来源有二，即本人收集和友朋代寻或赠送。

缪荃孙在十二三岁时居江阴申浦老屋，屋中存书四大橱，在从族兄缪犀读书之余，即“取阅之诸史杂家，尤所心喜。”^③咸丰十年（1860）江阴战乱，其书被毁，只字不存，因此缪荃孙的藏书均是他日后靠持之以恒地搜罗，日积月累而形成的。

缪荃孙的一生南北奔波，历十六省，其所到之处均留下了访求典籍网罗群书的足迹。

自江阴战起举家转徙江淮，“流离琐尾，亦时购零本以消永日。”^④这是缪荃孙最早的收书记录。此时他还在从师就读，购书只不过是一种消遣。至咸丰十一年（1816），因患疟疾，寓淮安姑丈家中，加之捻军已近，无力从师，故终日研读《随园诗话》、《吴会英才集》、《洪黄两家诗》、《文选》等，并仿其体例风格而为之，“散步湖滨，吟咏成帙。”^⑤此间，所收之书成了他无师自学的教材，这也是其利用藏书的开端。

缪荃孙真正的收书活动则起自至四川读书之后，“甲子游蜀，受知于李顺德师昂以目录之学，三上春官，陆遵秦晋，水出蜀豫，遇书辄购，所积遂多”。^⑥

而缪荃孙大宗购书则有两次。一次是在任翰林院编修时，他殚心著述，一有闲暇即至琉璃厂海王村书肆搜访异本，时值有“五部侍郎四部尚书”之称的汤金钊欲假归乡里，其家藏全部出售，缪氏即以千金购得一部分；第二次是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缪荃孙经上海入京，“在沪见蒋香生太守书，在都见方柳桥太守书，购及千金。”^⑦

除上述两次大规模购书外，缪荃孙还利用一切机会广收博集以充家藏。

光绪四年（1878）十月，由重庆乘船至武昌，经镇江、扬州，见售书甚多，其版本之精良，美不胜收，于是从旅费中出资购书多种。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受张之洞聘主江宁钟山书院，当时南京为东南大都会，文化事业发达，书商往来，学子聚集。“故家藏庋，时时散出，苏沪密迹，估客奔辘，所收旧籍、金石、书画乃益富。”^⑧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补庚子科场，书贾云集，得书极多。”^⑨即便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赴日本考察期间，缪荃孙亦不忘收书，“得暇即搜看旧书。”^⑩

缪荃孙的藏书除自己收集外，还有一些是友朋代购或赠送。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艺风堂友朋书札》中，记录了缪氏同时代知名学者一百五十七人与之论学的书信，从中可以看到有许多学者曾为缪氏代购、代抄或赠送过典籍，这当中尤以汪鸣銮、叶衍兰、沈曾植、梁鼎芬、李慈铭、叶德辉、傅增湘、王先谦、罗振玉等为最多。他们或受缪氏之托为其寻访所需之书；或借到珍籍请人抄录双部，寄与缪氏共享；或将近刻之书及所购之书相赠。

以数千金购得汤金钊、蒋凤藻、方功惠部分家藏为基础，以广收博集为充实，以友朋代购、赠送为补充，逐渐形成了缪氏治家所需的完整家藏。

观缪荃孙收书经历，其特征有三：

第一，我国私人藏书的基础来源主要有二。一为祖传继承，本人充实。如清乾嘉年间的孙星衍就是继承其父孙书屏之数柜藏书后，穷搜极聚而成孙氏祠堂、廉石居、榭园等书藏。二为本人创业。这类藏书家或因祖上无聚书之好，或因前代藏书被毁，因此无家藏递传，完全凭本人努力，持之以恒，搜寻不怠，积腋成裘，终成大家。如清雍正年间的吴騫，靠节衣缩食，竭平生之精力而创建拜经楼。缪荃孙则属后者。

第二，利用为官之便广收典籍已成为许多藏书家收集图书的

重要手段。孙星衍收书最盛时期就是他在山东作官时候，那时他经常往来于曹南、历下等地，加之官俸较多，故访书、购书极为方便。而缪荃孙一生似乎与高官厚禄无缘。“光绪二年丙子进士，授职编修，充国史馆总纂，以一等引见，记名道府，加四品卿衔，乃以性刚遇奇，未得显达，仅历主讲南菁、泺源、钟山各书院，充江南高等学堂监督，主办江南图书馆，奏充京师图书馆监督而已。”^⑪不作高官就无厚禄，因此在购入典籍时常常出现囊中羞涩的情况，即便是在京任职期间，为收书也要“典衣购取”。^⑫既无官可凭，又无资可依，故其在从事收书活动时往往会付出更大的艰辛。

第三，缪荃孙藏书的目的是在于利用，首先是校刊。在从事这项学术活动中，与当时许多著名学者交往甚密，进而形成了互借藏书，交流治学的关系，“潘吴县师、翁常熟师、张南皮师、文治庵丈、江郎亭前辈，蔡松夫、黄再同两同年，盛伯羲、王廉生两祭酒，周芸生编修，王苇卿、徐梧生两户部，陆纯伯中翰，互出所藏，以相考订旧刻旧钞。”^⑬在交往中，许多学者赞赏缪荃孙的学问，敬佩他的为人，并相互建立了藏书家的友谊，代寻典籍，互赠图书则是这种友谊的具体表现。友朋的帮助使缪荃孙的收书活动从地域上得以扩展，并且也多少弥补了他在购书时经济上的不足。

二

缪荃孙藏书的具体数字今已无可考知，而其《艺风藏书记·续记·再续记》中所收录的典籍则是缪氏藏书的精品，其所记共一千四百五十七种，近三万五千卷。通过对这些典籍的统计分析即可得出缪氏藏书的基本特征。

现将其所记之书列表统计，按经（经学、小学）、史（史学、地理、目录）、子（诸子、类书、艺术、小说）、集（诗文集），从

典籍内容上归类，为经；以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旧抄本、传抄本、影抄本、校本、稿本等版本形式为纬，记其数量。

版本形式 \ 内容归类 数量(种)	经		史			子				集	总计
	经学	小学	史学	地理	目录	诸子	类书	艺术	小说	诗文集	
宋刻本	16	5	8	2	0	0	0	0	1	19	51
元刻本	17	5	10	0	0	9	6	2	1	32	82
明刻本	88	59	62	28	2	34	25	7	16	225	546
旧抄本	10	30	72	17	15	23	10	14	15	155	361
传抄本	3	16	35	15	21	0	5	7	4	80	186
影抄本	8	10	15	1	3	4	1	0	2	25	69
校本	4	4	11	1	1	0	3	3	8	32	67
稿本	9	3	4	8	12	1	0	1	1	1	40
其他(含日本、朝鲜版本，不可知刻印年代的版本)	5	15	6	0	3	3	2	1	3	17	55
总计	160	147	223	72	57	74	52	35	51	586	1457
	307		352			212				586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就缪荃孙藏书的内容而言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其所藏集部诗文集最多，占所记典籍的40%。虽然我们无法估计缪氏所收的全部诗文典籍在其全部藏书中到底占多大比例，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其三个藏书记中可以看出他是下了大力气收集诗文集的。在此类中，又以文集占多数，《艺风藏书记》共收诗文集二百六十九种，其中明确注明为文集的就达一百多种。着力收集诗文集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为满足日常读书的需要，从《艺风老人日记》中不难发现，缪荃孙读书治学非常勤

奋，几乎是每日必读书，而所读之书绝大多数是历代诗词或名家文集。其二是为了满足著述所需，他曾参与修纂过《清史稿》中的五门列传，当中许多资料均取自于其所藏传主的文集。

除集部外，缪荃孙藏书中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史部典籍。缪氏一生在史学研究领域涉猎颇广，从谱传到地方史志无所不及，且尤以金石善长，反映到藏书活动中则是注重家谱、传记、方志、金石等类文献的收藏。另外，其目录类共有典籍五十七种，这当中包括书目、书籍和金石三小类，仅就书目而言，就包括了一些著名的藏书目录，如《百川书志》、《千顷堂书目》、《绛云楼书目》、《佳趣堂书目》等。

从藏书版本上看，缪荃孙所记藏书中明刻本最多，达五百四十六种，占所记藏书总量的38%；其次为旧抄本，共三百六十一一种；最少的则为稿本，仅四十种，占所记藏书总量的2.7%。

观其版本有如下特征：

第一，珍善之本居多。从整体上看，缪荃孙所记之书多未被《四库》所著录。《四库全书》的编修过程实为中国典籍的一次大集聚，但因多种原因，其未收之书、名家孤传之稿共十余万卷，缪氏在广收博采中尤注意对这类典籍的收藏，并于庚子夏秋之际将这部分书“略举人之仕履，书之大意，得书六百二十七种，一万九百六十二卷，用孙祠书目例，分为十余，编成八卷。”^④即《艺风藏书记》。十年之后，缪氏先东渡日本，又观书于四明天一阁；再领江南学部两图书馆，颇见异书。这其中“有购者，有易者，有传抄者，有影摹绝精者。”^⑤于是再成《艺风藏书续记》。晚年缪荃孙居上海，生活困顿，但“遇心喜之书，相当之值，遂损衣食之费而置之。”^⑥于是又成《艺风堂新收书目》，即《艺风藏书再续记》。从缪荃孙的三个藏书记自序来看，其所记之书均为珍善典籍无疑。

除此之外，所记之书中亦不乏名家校刊和题跋的精本。如

《老学庵笔记》即是其中一例。该书十卷，为过录黄丕烈校影宋本。顾广圻在跋中讲，该书曾被毛晋刊入《放翁集》，陆貽典先用抄本校过；毛晋又用影宋本校后五卷，用残本校第七卷后半卷及第八卷，改补多处；之后顾广圻又将其通校一遍。黄丕烈在跋中说，他曾用新收影宋本校前五卷，并钩勒行款以补陆、毛校本所未及。该书校刊之精良，由此可见。类似之书在三个藏书记中不为鲜见。

第二，递藏之书较多。缪荃孙所记藏书多有递藏，即以前被其他藏书家收藏过。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私人藏书家大多有一种共识，即在收书的过程中广集珍本。而就一种典籍来看，其经手收藏的藏家越多，则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其越为珍贵。缪氏所记的藏书中，这一特点显得较为突出。如仅就众所周知的《太平御览》而言，其所藏为明抄本，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三个字，上有味径书屋朱文小方印，小琅嬛清函张氏收藏朱文椭圆印，若衡朱文方印。由此可见，在缪氏收藏之前，最少已有三位藏书家收藏过此书。类似这种情况在缪氏所记的藏书中约占30%。

第三，宋元刻本少。有清以来，私人藏书家追寻宋元刻本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黄丕烈取藏书处名为“百宋一廬”，而吴騫亦不甘落后，名其藏善本书处曰“千元十驾”，“为慕一廬藏百宋，更移十驾度千元”。^⑦清末四大藏书家则更是登峰造极，争相购入宋元刻本，其中陆心源为了标榜其藏书超过“百宋”，将藏书处取名为“皕宋楼”，意为所藏宋版多达两百部。缪荃孙则一改这种风气，在收书过程中不刻意追求宋元刻本。缪氏在三个藏书记中收录的典籍多是有价值的珍善之本，所以估计其所藏宋元刻本均应包括在内。宋元刻本共计一百三十三种，虽在所记藏书中占9.1%，但若将其放置在全部分藏书中考察，则微不足道，更不用说同“百宋”、“千元”、“皕宋”相比了。

缪氏藏书宋元刻本少的原因有二，一为当时在全国出现了私家藏书聚集，宋元刻本已多为象四大藏书家一类财力雄厚的收藏

者所藏，社会上极少，即便是有，也是物以稀为贵，罗振玉曾告知缪荃孙“都中善本书几计叶论价，不敢问津。”^⑮所云之善本自然包括宋元刻本。极高的价格对缪荃孙来讲是难以承受的。二为缪荃孙藏书的目的是治学，并不是为了向人炫耀，宋元版刻因其具有准确的文字，固然有利于校刊，而缪氏所藏的校本、旧抄本，特别是影写本，也同样可以起到上述研究作用。因此，宋元刻本对缪荃孙来讲也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

三

自古藏书多遭不测，隋人牛弘总结藏书易遭五厄；明人胡元瑞亦有十厄之说；而明末清初的曹溶则更有“自宋以来，书目十有种，粲然可观，按实求之，其书十不存四五。”^⑯缪荃孙对此则认为藏书聚散是常事，应泰然处之。但对前人藏书因国难亦多散佚，而不能流传后世甚表遗憾。他认为造成这一局面，应完全归咎于藏书家秘而不宣的做法，“咸同以来，京师钜公以深藏为旨，以独得为奇；不留一目，不跋一言。问其名已在若存昔亡之闲，述其事亦在疑是疑非之列，顾千里所谓与古人有深仇宿怨者。”^⑰

在对藏书聚散有一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在注重藏书流传和总结前代藏书家经验教训的前提下，缪荃孙逐渐形成了“书去目存”的藏书观。“身后生前聚散同之，即士礼居之储藏，晚年亦有去刻留钞之叹。隐湖之易参，虞山之挥泪，前型具在，何敢怨尤。至于书去目存，昔贤以之慰张金吾者，吾亦籍之以自慰也。”^⑱“书去目存”的藏书思想虽出于无奈，但从中我们看到了缪荃孙对待藏书豁达开通的一面。正是这种开明思想才使得缪荃孙在同好指名以索，待价而沽后，在系恋之余亦有所幸；^⑲也正是这种开明思想才导致了缪荃孙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三日捐书给学堂的义举。^⑳

“书去目存”的开明藏书思想使缪荃孙极为注重家藏同世流通

和后代流传，其具体表现为：

第一，公开家藏，与人共享。闭门锁籍是缪荃孙以前和同时代许多藏书家的做法。如明天一阁主范钦去世之前曾为子孙定下规矩，库门钥匙，每房子孙各执一把，若入阁，则子孙到齐方可；阁中之书绝不外借，子孙有读书之志者，可就阁而读，不可将书携出。可见天一阁封闭之严。而缪荃孙则一改这种习气。

他首先将藏书的珍善之本，编成《艺风藏书记》，并付梓刊刻；之后又将成书多方赠送，仅据其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日记中载，所赠友朋的《艺风藏书记》就不下二十部。缪荃孙曾持《艺风藏书记》谒张之洞，“公阅之以为善，复谓之曰‘不畏人指名而索耶？’荃孙应之曰‘本是待贾而沽耳’。”^④缪荃孙的回答在当时只不过是句笑话。但其友朋如王懿荣、梁鼎芬等的确据《艺风藏书记》按图索骥向缪氏借书而阅。由此可见《艺风藏书记》实际上是缪荃孙向广大友朋敞开了自己的藏书之门。自此，友朋往来借书者常年不绝，藏书流通甚为频繁。笔者对《艺风老人日记·壬寅日记》进行了大略摘录（见本文附录），一年当中其所借出和还回的典籍不少于三十三种。平均每十天就有一种藏书流通。这一数字在今人看来不足为奇，但对于清末私人藏书家而言却较为可观，况且该年正值缪氏举家移迁，藏书多有封箱，流通甚为不便。

第二，刊刻丛书，流传家藏。张之洞曾强调过刻书活动能使“藏书终不废”。认为刻书者的刊刻行为是“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⑤他不仅将刻书传名的思想付诸笔墨，而且身为表率，在其所创办的广雅书院刻印图书达百种之多。

缪荃孙曾为张之洞的幕府成员，因此受其影响颇深，在从事刊刻活动中又从藏书家的角度认识到刊刻丛书的重要性，并将张之洞的刻书思想发展为保存典籍，以传后世。“单缣另帙最易消磨，有大力者，汇聚而传刻之；昔人曾以拾冢中之白骨，收路弃之婴

儿为比，则丛书之为功大矣”。^⑤

缪荃孙刻书始于清光绪八年（1882），“是年刊《万善花室文集》、《洪幼怀文集》，为荃孙刻书之始。”^⑥之后他就常年刊刻不辍，且尤重丛书之刊刻，并将其做为流传藏书的一种主要手段。成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常州先哲遗书》，共四十二种，三百一十六卷，“则全出先生（缪氏）藏本，编校亦一手所成。”^⑦缪氏所刻丛书还有《云自在龕丛书》，五集，十九种；《对雨楼丛书》，五种；《藕香零拾》，三十八种；《烟画东堂小品》，二十五种。这些丛书大多从缪氏藏书中所辑。今天缪荃孙的藏书多已散佚，而我们可以从其所刻的丛书中见到其部分藏书的原貌，由此可见缪氏借刻丛书来使其藏书留传后代的目的是达到了。

综上所述，缪荃孙所处的时代正值国家内忧外患，战乱四起，此间藏书楼被毁，典籍亡佚之事常有发生。无情的社会现实使他逐渐形成了书去目存的开明藏书思想，加之一生颠簸，既无高官可做，又无厚禄可享，于是就走上了一条不同以往敢于冲破旧有模式的藏书之路，并形成了勤于收集，善长整理；不求追异，力主实用；注重流通，刊藏传世的特点。也正是具备了这样的特点，才使得缪荃孙能从其以前藏书家传统的“书奴”形象中摆脱出来，成为开一代私家藏书之新风气的代表。

附录：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缪氏藏出借出、归还摘录

- | | |
|--------|--------------------------------|
| 一月四日 | “《善鸿集》，姚璧挺还”。 |
| 一月十五日 | “发何满堂信，寄《永嘉八面锋》八卷、《太平经图》之书全部。” |
| 一月二十二日 | “窦体仁交《八面锋》未册来。” |
| 二月十五日 | “聚卿借《梅林乐府》。” |

- 二月十六日 “傅黄生借《文苑英华》十函去。”
三月一日 “收回《普通歌注》、《礼书初编》、《江宁舆地略》共四册。”
三月三日 “罗叔蕴来拜行，还《其地文学》一本。”“黄生还《英华》八十三本。”
三月五日 “次山借《思无邪堂答问》去。”
三月二十三日 “丁秀甫索《七经》首帙去。”
四月九日 “曹揆一还《词学丛书》、《花庵词选》来。”
四月十日 “曹揆一借《齐东野语》、《通书类编》去。”
四月十六日 “曹君直借《方輿胜览》及《词本》去，还《全方备祖》《齐东野语》。”
四月二十五日 “柳翼谋借《雁词集》去。”
五月一日 “曹揆一借《地图综要》去。”
五月十七日 “聚卿索《李翰林诗》，小字《五经》去。”
七月二十九日 “胡研生借明刻《宛陵集》去。”
八月二十四日 “积余还《读史记十四表》四册来。”
九月二十三日 “叔芾还《雀愿志》来。”“柳翼谋借《东华录》、《武功纪盛》去。”
十二月二十日 “蒯礼卿还《汉书疏证》来。”

摘自《艺风老人日记·壬寅日记》

注：

- ①②⑦⑧⑫⑳夏孙桐：《缪艺风先生行状》。
③④⑥⑬㉑㉔缪荃孙：《艺风藏书记·藏书记缘起》。
⑤⑨⑩㉒缪荃孙：《艺风老人年谱》。
⑪薛祈龄：《艺风藏书再续记·跋》。
⑭⑮㉓缪荃孙：《艺风藏书续记·缘起》。
⑯缪荃孙：《艺风藏书再续记·自序》。
⑰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
⑱《艺风堂友朋书札》下册，10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月。

①⑨曹溶：《流通古书约》。

②⑩⑥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辛壬稿》卷二，《兰湖葛氏书目·序》。

②②③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壬寅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4月。

②⑤张之洞：《劝刻书篇》。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一处错讹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七“曹操引兵取壶关”一节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建安十年春正月……（曹）操引兵入南皮，安抚百姓了当，忽有一彪军来到，乃是袁熙部下战将焦触、张南。操自引军迎之。二将皆倒戈卸甲，特来投降。操亦封为列侯。……操自引军攻幽州，来破袁熙、袁尚。……随差焦触、张南……各引本部兵，分三路进攻幽州。操兵缓行接应。

袁尚知操兵到，前队皆是河北降兵，二人商议弃城，引兵星夜奔辽西而去投乌丸（原注：番邦也）。幽州刺史乌丸触（原注：番人之名）杀白马为祭，聚幽州众官，歃血为盟，共议背袁向曹之事。乌丸触先歃血，言曰：“吾知曹丞相当世英雄，今往从之，如不遵令者腰斩。”依次歃血。至别驾韩珩前，珩乃掷刀于地而言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公主败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义缺矣！若北面而降曹氏，吾不为也！”一席之人尽皆失色。乌丸触曰：“夫兴兵大事，当立大义。事之济否，不待一人。韩珩既有志如此，听其自便。”推珩而出。乌丸触乃出城迎接三路军马，径来投降。操大喜，加为镇北将军，幽州太守。

而《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的记载为：

建安十年春正月……袁熙大将焦触、张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乌丸。触等举其县降，封为列侯。（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下转第221页）